

# 夔龍是什麼龍？

## ——作為地方信仰實踐的遠古神話

陳泳超\*

### 摘 要

在遠古神話裡，夔和龍分別作為舜帝的樂官和言官而明載典籍。在湖南省藍山縣，他們被認為是舜帝南巡禮樂教化的隨奉大臣而受到立廟祭祀。後來夔廟被加載了禱雨功能，並且很可能是地方知識階層之所為，因而夔廟禱雨變成了當地歷史悠久且官民同行的一個地方習俗。而民衆在這一習俗基礎上的信仰實踐，始終將夔與龍連帶稱呼，並逐漸脫離遠古神話中的官家職守，將之視為將軍或神獸之龍，乃至於僅剩夔龍之名而實之以菩薩信仰等。在這個信仰實踐的變異過程中，分明可見地方知識階層與民衆之間有保留的順向互動關係。

**關鍵詞：**夔龍、信仰實踐、禱雨、知識階層、順向互動

---

\*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What Kind of Dragon Is Kui Long? An Ancient Myth as Local Belief in Practice**

Chen Yong-chao<sup>\*</sup>

### **Abstract**

In ancient myth, Kui was a functionary of music and Long was a functionary of language, both of them worked for Emperor Shun, so their names were written in ancient books and records. In Hunan Province Lanshan Xian, people built temple for Kui and Long, because people believe that when Emperor Shun went to south of china, they were functionary of education with Emperor Shun. Afterward people added the power of pray for rain in the Temple of Kui, and it was probably did by local gentry, because officials and democracies prayed for rain together in the Temple of Kui for a long time, so it was become a local belief. People always call Kui with Long directly in practice, and changed their images from functionary to general or dragon. At last Kui and Long only could keep their own names, but their shapes was changed to Pu Sa in this local belief. We can see clearly about som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gentry and democracies in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is local belief.

**Key words:** Kui Long, local belief in practice, pray for rain, gentry, interaction

---

<sup>\*</sup>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 夔龍是什麼龍？

## ——作為地方信仰實踐的遠古神話

陳泳超

### 一、前言

本文的寫作，緣於最近一次田野考察的刺激。

作為古史或神話的堯舜時代，是被傳統主流觀念推舉的遠古黃金時代。古典文獻幾乎衆口一詞地記載，舜帝晚年親自南巡，崩殂於蒼梧之區，即今永州寧遠縣九嶷山。他的兩個妃子萬里尋夫，自沉湘江，留下了哀感頑豔的女德傳說。至今瀟湘水域，到處可見關於舜帝、二妃的種種遺跡，並有很多相關傳說流淌於民間。筆者 10 年前爲了撰寫《堯舜傳說研究》的博士論文，曾親赴該地做田野調查，撰成《永州之野覓舜跡》<sup>1</sup>一文。當時最大的感觸是，自己的所見所聞比諸當地的實際留存，不啻天壤，因此一直在尋找重訪永州舜跡的機緣。2009 年 9 月 5-8 日，利用參加湖南省祭舜公典的機會，再次踏上那片神往的土地，並在上次足跡未至的祁陽、藍山等地做了一次尚嫌膚淺的田野調查。

在藍山縣，當地幾位舜文化研究者帶我來到這所城鎮，探訪了舜岩和舜廟，不期來到黃泥鋪村舜水河邊「望嶷亭」，據說此處可遠望九嶷山最高峰，山那邊就是寧遠舜陵了。亭子的樣式很別緻，像是一座風雨橋。盤桓良久，我看見亭子後面還有一個小丘，林木森森間露出幾處廟宇式的簷角，就問那是什

---

<sup>1</sup> 陳泳超：《堯舜傳說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第 368 頁。

麼所在。同行者說是「夔龍廟」。我一時不解，問其中供奉什麼神靈，回答說是舜帝的「兩個將軍」。我恍然大悟，原來是傳說中舜帝的兩位大臣夔和龍。《尚書·堯典》中記載夔為「典樂」，是禮樂教化的樂官；龍為「納言」，也就是執掌上言下達、下言上達的喉舌之官<sup>2</sup>。

其實，照典籍上說，舜帝執政時期，雖然有二十二位著名大臣，但真正有專門職守的重要朝臣僅九人，而常為人稱道的主要是禹、伯益、后稷、契、皋陶等，即《論語·泰伯》中所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sup>3</sup>，他們被一些地方崇祀至今，筆者見到過不少，比如在山西的堯陵、堯廟等地，通常陪祀的都是這幾個人，有些地方還有他們各自獨立的祠廟。但夔和龍在這批俊傑大臣中並不突出，其所執掌也相對不太重要，此前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的塑像和香火，怎麼在荒服南蠻之地，卻捨去了大禹等名臣而專供他們二位呢？但我很快就想通了，典籍傳說中舜帝的南巡，不是刀兵征伐，而是來巡狩和教化的<sup>4</sup>。至今湘江流域，有很多跟舜帝時期音樂相關的傳說遺跡，比如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就是從舜帝時期的《韶》樂而來；就在藍山縣離此處不遠的地方，還有一個地名叫「南風坳」，而《南風》正是舜彈琴作歌、為天下祈福的樂名。既然如此，那麼舜帝帶著樂官夔和言官龍來，從傳說的邏輯而言，是再合理不過的了。只是被今人叫做「將軍」，難免有征戰的意味，多少辜負了舜帝的良苦用心。

完全沒想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竟會碰到如此偏僻卻又符合傳統經典的祀典，我激動不已，馬上就想上去看個究竟。但當地學者非常肯定地告訴我說上不去，因為小丘上早已林臻草密，恐有異蛇出沒。我只好斷了念想，遠遠看去，廟為前後兩進，圯廢久矣。

<sup>2</sup>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31-132頁。

<sup>3</sup>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84頁。

<sup>4</sup> 《韓非子·五蠹》：「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諸子集成》本（上海書店，1991年）。

回到住地，翻閱一些地方風物簡介的資料，發現離縣城不遠處還有一座夔龍山，山上據說有夔龍廟。第二天一早，冒著攝氏 37 度的酷暑，在當地文化幹部的帶領下攀登夔龍山。在山腰處，我看見另一側的山下有一處嶄新的廟宇。文化幹部說叫「都龍廟」，新近重建的，名字的意思，據他們說可能是對夔龍的「夔」字不認識，就改成「都龍」了，這樣的解釋我很懷疑。至於廟裡供的是什麼神像，他們都說不知道。到達山頂，發現沒有現成廟宇，卻見一群善男信女非常辛苦地在自發修廟，在臨時搭建的神棚裡，供奉的都是財神、關帝、土地等民間神靈，大棚裡則供奉著主神觀音菩薩和彌勒佛。據那些信女們說，她們中的一個能感知神靈的啓示，是觀音菩薩要他們上來修廟的。我就問那個通神的信女：不供夔龍嗎？她茫然不答。我換個問法：夔龍是什麼啊？不知道。那建好了廟還叫夔龍廟嗎？是啊。爲什麼？這個山就叫夔龍山嘛！

後來，另外一個信女很熱心地把我拉到山頂正對縣城的一塊空曠地方說：你看這裡，當年有個廣東的風水先生來看過，說這個山頂就像天庭，七仙女她們都在這裡走動，我們腳下這座夔龍山是一條龍，你看像不像啊？（我看像）左右的山還有兩條龍，你看見吧？（我看見了，確實挺像的）因爲龍很凶，所以要在上面造一個觀音廟鎮住它。（那龍是壞的嘍？）不是，龍是好龍。（那爲什麼要鎮住它）因爲菩薩和龍一起保佑藍山縣風調雨順，人民都好。

我問山下那個都龍廟是怎麼回事，她說那廟原來就在山上這個位置，後來不知什麼時候遷下去了，早就毀了，也沒有碑，這個新廟是 2005、2006 年建成的，裡面供的也是菩薩，千手千眼觀音。（那有夔龍的神像嗎？）沒有的，跟上面一樣的，都是菩薩。（那這個都龍廟和你們要造的夔龍廟是什麼關係？）上面的廟是外婆，下面的廟是外孫女。（爲什麼？）不知道，都是這麼說的。她爲了取信於我，特意指給我看一些殘留的建築痕跡說：你看，原來的這些磚很薄，不像現在的磚很厚，說明這上面原來是有廟的。

下山時，我非常想請當地文化幹部拐去都龍廟看看，可是，看到他們個個渾身透濕精疲力竭的樣子，我沒敢開口，雖然至今還感覺很是遺憾。

兩個不很知名卻非常古老的神話人物夔和龍，在千百年的在地化過程中，

變成了兩個將軍還好說，變成了如今善男信女們觀念中的一條神獸之龍，確實有些荒誕了。民間信仰中這樣的荒誕變形原也不足深怪，堂堂的伍子胥和杜拾遺可以變成五髭須和杜十姨併合為配偶神<sup>5</sup>，不也荒誕談諧得很嗎？只是，像五髭須這樣的變形信仰都只告訴我們一個結果，沒有過程，因而也沒有展示出更多的民俗歷史資訊。而翻閱藍山縣的縣誌等地方文獻<sup>6</sup>，筆者將為當地夔龍信仰的變化梳理出一個雖然斷續卻可以理解的貫通脈絡來，尤其是在這個變形過程中，我們可以考察當地知識階層是如何與民衆發生有保留的順向互動，並一起塑造、經營著一種地方神靈信仰的。爰有下文。

## 二

通過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所出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全文版）的軟體檢索，「夔龍廟」一詞無見。作為舜的隨奉大臣而建祀的「夔廟」和「龍廟」，也只看到《湖廣通志》等方志中有記載，都在藍山縣。所以，從現有材料來看，暫時可以把這兩位大臣的祠廟，看作只是藍山縣的特例現象。

其實，現在被當地人習慣稱呼的「夔龍廟」，在當地史志上從來不存在，夔和龍向來是各自有廟分別祭祀的。

《民國志》卷五「山川」中記載：

夔峰在縣西二里，以夔得名，其下夔廟，亦謂之都潔廟，有都潔井焉。

<sup>5</sup> 宋·高文虎《蓼花州閑錄》曰：「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為十姨，何雌我邪？』」收於《叢書集成初編：雞肋編附校勘記續校》（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第 11 頁。

<sup>6</sup> 本文主要借用兩種地方誌：一為胡鶚薦、洪錫綬修，鐘范纂《藍山縣誌》，同治六年（1867 年）刊印，下文簡稱《同治志》。一為鄧以權修，雷飛鵬纂《藍山縣圖志》，民國二十二年（1933 年）刊印，下文簡稱《民國志》。

都潔不知所由名也，或曰，夔峰尚在縣西北十里竹管寺地，都潔井之夔廟，乃後移此。

龍廟在縣西北十二里，大慈鄉上鳳頭之龍川。

據當地學者劉淮《「三藍八景」古今談》說，龍廟位於今天藍山縣「竹管寺鎮上豐頭村後，廟前有一小溪，亦名龍川。」<sup>7</sup>與《民國志》所謂「上鳳頭之龍川」當為一地，而夔廟早年亦在「縣西北十里竹管寺地」。顯然，最早的時候，夔、龍二廟共處於離縣城較遠的同一山鄉，至於這兩座廟是什麼時候創建的，史志無載，提到最早的是唐代縣令莊武龍曾經留下一通《龍山廟碑》的文字，但也只知其名，碑文無傳，因而也無法考訂了<sup>8</sup>。我們現在於藍山縣城邊上看到「夔龍山」腳下新建的「都龍廟」，當是「都潔廟」的不同記音。至於山上善男信女們說的原有廟址，也是頗有根據的，《民國志》「禮俗二」中記載：「夔廟城西三里夔峰，舊在山巔，後移於麓，一名都潔廟，祀后夔。」難怪善男信女們能指給我們看早年廟址的建築痕跡，而將山巔的廟說成是山腳的廟之外婆，則顯示了民間信仰慣用的擬親屬法則。至於黃泥鋪村「望巔亭」邊上我們最先看到卻無緣攀登的那座「夔龍廟」，筆者沒有看到任何文字記錄，也還沒來得及從當地人口中訪談到任何相關資訊，姑存不論。

如今藍山縣的夔廟與龍廟所處的格局，至少在元代已經形成。《民國志》卷十二「禮俗二」裡，節選了元代縣尹邱仲熙的一篇《龍廟記》<sup>9</sup>，裡面提到在延祐庚申年（1320年），已經是「縣有舜廟在舜鄉，夔廟在城西夔山下，龍廟在大慈龍川沖，事載祀典，殿宇崔嵬，皆一方之瞻仰也。」而把夔和龍稱為「將軍」，至少在清代嘉慶年間也已經通行，了，《民國志》卷十二「禮俗二」裡

<sup>7</sup> 蔡建軍主編：《神美藍山》（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58頁。

<sup>8</sup> 這一說法都來自於1885年卞寶第等修撰的《湖南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二百六十七「藝文·金石九」所載：「唐龍山廟碑《名勝志》：在藍山縣，莊武龍以唐大和間知藍山事，遂家焉。」並無碑文。

<sup>9</sup> 全文見《同治志》卷三十三「藝文」，因無關宏旨，本文從《民國志》移錄。

保存了嘉慶年間曾任藍山縣令的譚震所撰《夔廟記》，中云：「夔峰之下，夔廟在焉。土人謂之都潔，又稱為將軍。」至於廟宇裡的神像到底是什麼樣子，沒有明確記載，但據《民國志》卷五「山川」引錄一首無名氏詠「藍山八景」之一的「夔龍古廟」詩云：「九官遺有二官祠，遺像端嚴儼若思。傾耳宛如聞樂日，俯躬還似納言時。不因萬乘巡南嶽，焉得群臣列九嶷。前席當年敷奏罷，簫韶還引鳳凰儀。」假如我們將此詩作並不純粹看成文人的傳統想像而是具有一定寫實因素的話，那麼，當時夔、龍的塑像造型或許還是突出其典樂、納言之官職身份的。此無名氏不知何時代人，但肯定在譚震之前，因為《民國志》在引錄此詩之後隔了幾個詩人才引錄了一首譚震的詩。而到了譚震任縣令的嘉慶年間，上引《夔廟記》又曰：「瞻其像，□【漫漶不清，下同不注】然將也；視其碑，隱然都潔也。」顯然，這時候已經不是按其本職的那種文官形象，而變成將軍形象了，不過，無論如何總還是隨奉大臣的樣子，絕非龍形神獸可知。

那麼夔廟為什麼要從離縣城很遠的深山裡搬到山外縣城邊夔峰、又從夔峰山巔搬到山麓呢？這裡一個關鍵因素是夔離開了遠古神話的本源職守，負載了禱雨<sup>10</sup>的民俗功能。

《民國志》卷五「山川」中有一段編撰者的考證文字說：「聞之故老相傳，夔廟舊在山內，基石猶存，明以前縣官禱雨，及民間禱祀，必至夔廟，年久廟圯，地方官紳又以山深道遠，禱祀不便，乃移廟於山外，距城為近矣，由是夔峰之名，亦隨廟而改移。」此言不虛，《民國志》卷十二「禮俗二」又記錄了康熙年間縣令鄭夢坤寫的一篇《夔廟記》，其中說道「《通志》載，舜南巡狩，后夔隨焉，道經是地，爰立廟祀。及詢邑中弟子員，僉曰：是廟之祀，早禱則雨，雨禱則晴。」這段話對比鮮明，按照大傳統的說法，夔只是隨奉大臣；而在地方功能上，卻是主管晴雨的神明，而且這一地方性功能是自當地知識階層的「弟子員」之口，可見並非只是無知無識的愚民百姓所信奉實踐的。事實

<sup>10</sup> 這裡所謂的「禱雨」功能，準確說來應該有「早禱則雨，雨禱則晴」兩面，本文為了行文簡便起見，概稱為「禱雨」一詞，下同不注。



上，上引譚震的《夔廟記》，正是他作為縣令親自禱雨的一次實錄。

毫無疑問，這些縣官文人之輩，是完全清楚大傳統中的后夔身份與職能的，但是他們並不反對地方小傳統中將之改易為晴雨之神。本文感興趣的是，他們是如何調和兩種傳統的呢？

鄭夢坤在《夔廟記》裡，照例說了一通后夔典樂，以音樂教化大眾，使僻處荒蠻之地的藍山縣民也風化醇厚之類的道理，這當然是符合主流傳統的。但是接著他說：「《記》曰：樂由陽來。南方固生育之鄉也，藍之士民，肅肅乎叩夔廟之英靈，使雲漢無憂，屢豐有慶，鼓歌口適，幾相忘其所以然者，其真夔樂之苗裔耶？何綏和若斯之神且永也？」既然夔是典樂的，而南方是生育之鄉，說明南方的音樂是可以起到調和風雨氣候之功效的，舜帝所作《南風歌》正符合這個意思，那麼地當南陲的藍山士民求晴求雨，便是從本質上領會了后夔典樂的精神。這在傳統的義理上沒有阻礙，至於其中現實世界與信仰世界的區隔，是被有意無意忽略了。

譚震的《夔廟記》記載民俗更詳細，他不僅以考據家的姿態將「都潔」附會為「都樂」，以與后夔典樂職能相合；還將民間所謂的「將軍」稱呼解釋為對舜帝一切扈從的通稱，並以合理主義的傳說眼光，將舜帝、后夔南巡解釋為是舜帝前來探視他那個不成器的弟弟象，因為傳說象被封於有庠，即今零陵地區，離藍山縣不遠。可見，傳說的流傳與闡釋，從來不限定於某個固定的階層。最後他說：「《祭法》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今神既庇佑藍民，早乾有禱輒應，則其血食萬世，禮亦宜然。然則都潔將軍之為后夔也，抑別有人也，又何辨焉。」這裡乾脆承認，只要有益於地方民眾，就不必管神明出處來歷，是典型的實用主義信仰觀，體現了傳統官僚知識階層對於地方信仰最通融開放的姿態，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我們知道，禱雨在傳統社會裡是地方官必須參與的主要祭祀活動之一，但是向哪個神靈祈禱，各地差異很大，沒有統一的規定。而在藍山縣，具備禱雨功能的神靈其實並非只有夔，比如《同治志》卷之二「封域志·山川」載：「龍潭在石榴花峰，下有龍蟠伏其中，每旱禱之有應，今無水。」這是常見的龍王

型雨神；又卷之三「營建志·壇廟」載：「帝妃廟 即舜妃廟，在花園，傍有水火二將。每天旱，土人祈雨輿之，其行若飛，須與雨至，極其靈應。」這是傳說人物型的雨神，其身份與后夔相似。按照譚震的實用主義信仰觀，這些也是可以一併贊同的。但是我們看不到對於上述二位雨神更多的詩文記錄，它們似乎都只是「土人」的自發行爲，不像夔廟禱雨，是縣令帶頭、官民同行的一個地方傳統風俗。我們暫時不追究夔廟禱雨習俗的緣起，但是我們確知，鄭夢坤也好、譚震也好，他們當縣令的時候，這一風俗已經很牢固了，所以他們才會親自參加，才會爲之比附解釋，以證明其合法性。至於其他禱雨之神，他們可以置身事外、由著土人自覺自爲。不妨假設一下，同樣是禱雨靈應的雨神，假如當地官民同祭的是舜妃或龍王而不是后夔並相沿成俗，筆者相信鄭夢坤、譚震輩也一定會另有一番比附解釋的說辭爲之建構合法性的。說到底，如何建構合法性，對於知識階級來說並不困難，只要善於拼接傳統文化的各種要素並充分發揮文人的想像力即可；而選擇哪個物件來爲之建構合法性，才是知識階層關注權衡的！這裡充分顯示了地方習俗傳統對官僚文人具有的制約力量。

接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夔與龍同爲舜帝的隨奉大臣受到藍山縣官民的供奉，而且早年還是共處一鄉的，那麼禱雨功能爲什麼只加諸夔而不加諸龍呢？爲什麼當初到深山裡去求雨也只是對著夔，以至於夔廟三遷而龍廟卻一直原地不動呢？這裡面或許隱藏著更爲重要的歷史資訊，關係到夔廟禱雨習俗的起源。當然，起源的具體歷史過程非我所求，但它是緣起於民衆還是知識階層，卻是可以推斷的。

首先我們要明白，舜帝南巡教化，崩於蒼梧之野，是典籍明載之事，但典籍中從來沒有提到夔、龍隨奉的說法，筆者所見這一說法的最早記載，便是上引鄭夢坤《夔廟記》所謂「《通志》載，舜南巡狩，后夔隨焉，道經是地，爰立廟祀」。這裡的《通志》不知到底指哪本書，但筆者檢索《四庫全書》電子版，都未見相似記載，無論是鄭樵的《通志》還是《湖廣通志》，在「舜南巡狩」之後都直接跟上崩於蒼梧之野之類話語，絕無后夔、龍的名字出現。由此推斷，夔、龍隨舜帝南巡，本身就是地方傳說，它是根據舜帝南巡教化的經典

傳說推行出來的。而能知道這些典故，尤其能通曉夔、龍的官職身份並從將他們從舜帝身邊那麼多賢明大臣中揀選出來，筆者以為一定是知識階層而非平民百姓的造作。

其次，單從夔和龍這兩個隨奉大臣的名字上看，龍似乎更容易與禱雨功能聯繫起來，因為它與興雲布雨的神獸之龍同名，所以假如讓民衆在二者之間選一的話，按理應該選龍才對。但在現存的方志文獻中，對於龍廟沒有任何禱雨的記載，寫作《夔廟記》的縣令鄭夢坤同時寫過一篇《龍廟記》，卻只管按照大傳統典籍裡關於龍為納言的記載，大談藍山對於三苗邊裔在監視防範上的重要性，隻字未提求雨功能；那個元代縣尹邱仲熙的《龍廟記》也大致相同。顯然，龍廟始終沒有獲得禱雨的功能。而夔廟之所以獲此功能，與其本源職守密切相關。中國自古以來就認為律呂音樂具有觀測氣象甚至改變氣候的功能，所以歷代正史多設「律曆志」以記錄天地社會的大事，《晉書·律曆上》說：「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葉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sup>11</sup> 前引鄭夢坤、譚震的兩篇《夔廟記》，都是用的這個傳統原理，《同治志》卷之十四「藝文」裡保留了譚震的一篇《夔廟祈雨文》，說得尤其明白：「因南巡而扈從，跡留遐裔；幸遺教之永播，祠伴高丘。赫濯聲靈，早顯異于移鐘換鼓；調和律呂，應有心於降雨興雲。今者旱魃為殃，彌月不雨。山川遍禱，回應無聞。神能福民，祀乃永享……」

這些大傳統裡固有的原理，主要掌握在官員和知識階層手裡，並非民衆的普遍知識，《史記·律書》開頭就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sup>12</sup> 由此筆者推論，夔廟禱雨，正是由地方知識階層根據大傳統而演繹宣導成為地方習俗的。相比而言，龍王、舜妃之類的雨神，則可能緣起於本地民衆階層。這就從另一側面解釋了本地縣官都只參加夔廟禱雨，而

<sup>11</sup>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十六·志第六·律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73頁。

<sup>12</sup> 《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239頁。

不參加對龍王、舜妃的禱雨活動了。

當然，對於一種地方習俗來說，知識階層的發明與宣導固然有很大的效力，但這一習俗若要獲得民衆的普遍認可並在當地持續發展，那一定要能容納民衆的某些觀念，哪怕是隱晦或變形的。就夔廟禱雨而言，筆者很難相信普通民衆具有上述律呂陰陽之類複雜的信仰理念，他們基本只是承接一種傳統，卻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給予某種解釋和改造。

就夔與龍兩者而言，筆者認為，在當地儘管具體禱祀的是夔廟，其實龍的身影也是閃現或者包含其中的。明顯的例證就是「夔龍」連稱，在當今我們接觸到的藍山人口中，「夔龍」二字總是連稱，似乎沒有區別，並且夔與龍所占比重也傾欹不定。比如方志裡把縣城西面的那座山峰只叫做「夔峰」、「夔山」，而我們接觸到的所有人士都叫它「夔龍山」；當地歷來有所謂「三藍八景」之說，其中之一就叫「夔龍古廟」，在《民國志》裡是分爲夔廟和龍廟兩張照片，但在《同治志》裡卻只有一幅線描圖畫，畫的是夔峰山麓的一座廟，旁注「都灤廟」，顯然指的就是夔廟，但卻可以包含夔、龍二祀。而「都灤廟」，現在人又都稱之爲「都龍廟」，那麼雖然祭祀的是「夔」，而名字上卻只剩下「龍」了。再進一步衍伸，將古代官員之龍轉化爲神獸之龍，在民間信仰的思維裡是非常容易達成的，而龍王型的雨神，在傳統觀念裡顯然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事實上，我們在夔龍山上訪問的那些善男信女們，不就把夔龍山比附成一條真龍嗎？而它的功能，也正是保佑藍山縣風調雨順。況且，即便在文字世界裡，夔龍合稱而指涉神獸之龍，也是早有先例的，因爲夔在上古記載中本身也可以是一種神獸名，其狀或如牛，據說有雷鼓風雨的神效，這與龍的形態和功能頗爲接近<sup>13</sup>，宋人就把上古鐘鼎彝器上某種特殊的屈曲動物紋命名爲夔龍紋。因此，夔與龍從分稱變爲「夔龍」合稱，從朝廷大臣變爲神獸，與其從人事官守

<sup>13</sup> 《莊子集釋·秋水》：「夔憐蚺。」《釋文》曰：「夔，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在位，諸侯于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諸子集成》本（上海書店，1991年）。

變為興雲佈雨的職能轉換，在理路上是可以對應的。

附帶一筆，在民間信仰的世界裡，神靈的功能不光可以發生轉換，還可以發生某種類同性的歸併。《民國志》「禮俗二」中記載：「夔廟，城西三里夔峰……祀后夔。歲旱官民禱雨有驗。明弘光元年建『好生堂』於西廊，祀唐公，求嗣者多驗。」這個唐公何許人也？據《民國志》「禮俗二」說：「唐公廟在普雲寺，相傳唐公者，唐公唐母，堯九男之一，從舜南巡，其像如田舍翁，祈子甚驗，即明縣丞楊福禱生子溥之地也。」這個莫名來歷的唐公唐母，比較可以肯定是民間信仰的創設，其主要功能是求子。弘光元年（1644年），該神靈被搬進了夔廟西廊。當然，這樣同處一字的歸併，並不表明夔神本身功能的增加，但選擇夔廟而非別的廟來安置唐公唐母，恐怕亦非純屬任意，多少還是考慮到二者之間在神靈背景上的一致性，堯的兒子不正和夔、龍一樣是舜帝的臣子嗎？而在對唐公的信仰實踐中，不只是普通民衆，官僚知識份子的參與也不遑多讓，明代著名大學士楊溥，就是其父楊福在唐公神前祈禱而得的；《同治志》卷三十六「方外志·寺觀」中更記錄了一大批從唐公那裡求子的著名官員。

既然神靈的功能可以如此轉換、歸併，順著這樣的理路，我們就不難理解現在夔龍山上山下的廟宇，雖然還保留著「夔龍廟」的名義（「都龍廟」也隱含著「夔龍」的基因），卻不再出現夔龍神靈的形象（無論是兩位官員還是一條神獸之龍），而代之以觀音菩薩了。因為觀音菩薩是全能型神靈，她不僅可以全面接管禱雨、求子功能，並且還有更非凡的神通。至於那位信女聲稱觀音鎮住山龍的說法，即便只是孤立的傳說，甚至可能只是對風水術語的誤會，卻也生動演繹著原有信仰的某種遺留（survival）。畢竟，經歷了二十世紀的文化劇變，夔廟禱雨這樣的習俗已被禁絕多時，不僅早被排斥出官方實踐，連民衆也不會特別看重了。所以，在當今純粹民間自發的信仰實踐中，過去種種幾乎只剩下「夔龍」這樣一個歷史稱謂了，自然可以由著民衆自己任意發揮。

總括而言，地方信仰習俗的起源未必都來自於民間，也可以由知識階層主導發明，它們會隨著時間不斷變異，這些變異我們都可以尋找到或明或暗的因緣和思路。儘管從結果上看，民間信仰中夔龍從官員變為神獸顯得非常荒誕，

但是知識階層爲后夔禱雨功能所尋找的解說，難道就是符合理性規則的嗎？它們不都一樣屬於「無稽的法則」<sup>14</sup>之列嗎？值得慶幸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演變歷程中，刻畫出知識階層與民衆信仰的順向互動關係。

### 三

上文分析的所謂順向互動關係，指的是在夔龍信仰實踐的個案中，從習俗的發明到傳播、流變各階段來看，知識階層與民衆都處於互相合作、互相生發的關係中，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對抗因素。必須說明的是，這一個案關係的演述，主要建基於地方史乘所提供的資料。而地方史乘的編撰，本身具有移風易俗、宣導教化的功能，所以其寫作對象，是經過知識階層預先篩選的，並不能體現知識階層對於民間信仰的全部態度。而在其他文獻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知識階層對於地方俗祀的批判與禁毀之類的逆向關係。事實上，即便進入史乘的地方信仰，其地位也是相對邊緣的。按照方志寫作的慣例，在信仰祭祀方面，總是先要詳細書寫社稷壇、文廟、城隍等國家正祀，然後才輪到這些地方民俗祭祀，儘管民俗祭祀的對象也可以是像舜帝、夔、龍這樣的偉大人物。《民國志》的「禮俗」篇，就分「通行典禮」、「俗祀」、「冠婚喪祭」、「歲俗方言」四個部分先後書寫。其中夔龍信仰是歸入「俗祀」的。在「俗祀」的開篇中，作者有很長的總論，可以代表知識階層對於民間信仰的基本態度

……故太上，人不媚神鬼，神鬼亦不禍福人，此絕地天通之效也；其次，人有戒於神鬼而存忌憚，故神鬼亦往往有禍福人之現相，因果報應，如影隨形，此神道設教之效也。今世破除迷信，不事神鬼，有似於太上之世，陳義極高，而人心譎險，則大戾於古。又並此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而抑蔑之，使益無忌憚……於乎，此不可大哀痛之者乎？……藍山南

<sup>14</sup>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北京：樸社，1926年），第25-26頁。

服，逼近百粵，其俗鬼且禳，類不能免，俗之敝久矣，雖然，有敝者，亦有善者，其敝者可革，而善者可因也。

傳統儒家的神道設教思想，是知識階層對於民間信仰最根本的態度。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夔龍禱雨的信仰實踐，那些知識階層也要一再證明它雖非正祀，卻不是「敝者可革」的淫祀，而是「善者可因」的俗祀。邱仲熙的《龍廟記》裡就說龍是「固其福國庇民之能事也」，「豈淫祀云乎哉」？《同治志》卷之十三錄邑人謝祿的《重修夔廟記》，也再三強調「豈淫祀也哉」？

不過，正祀、俗祀之分，已然表明了知識階層對信仰實踐固有的差序觀念，雖然俗祀可以接受甚至可以參與支援，但他們的態度還是有所保留的，至少不能僭越正祀的崇高地位，因此該作者接著就對藍山的信仰現狀大發感喟：

大抵民間俗祀，自諸鄉文會祀孔及文昌，務明正□，其餘多傳聞僞陋，相習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正者反廢，而僞者得自由以存而不改，道民正俗之謂何乎？……有教即有迷信，其不言迷信者，亦惟孔儒而已。

作為 1930 年代的知識份子，他們順應著破除迷信的時代思潮<sup>15</sup>，但其價值觀仍然與儒教傳統旨趣相近，念念不忘於「道（導）民正俗」，始終不願放棄作為民衆生活指導者的責任感和優越感，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說，他們還只是傳統知識階層的延續，不能接受民俗信仰本身自足存在的理念。他們與民衆的信仰實踐之間，依然顯露出萬水千山的隔膜。

---

<sup>15</sup> 關於 1930 年代前後的反迷信思潮，參見潘淑華《「建構」政權，「解構」迷信？》，載鄭振滿、陳春聲主編之《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98-122 頁。

